



责任编辑:程莉莉

新闻热线: (010)84151095

E-mail:grbnnmgzk@163.com

一家处境艰难的民办听力言语康复中心,76 个亟待“抢救性康复治疗”的听障儿童,共同演绎着另类坚守——

守望无声世界

本报记者 王群

本报实习生 吴萍

与小伟的对话宛如一次充满未知的探索。

见面初始,他生怯地低着头,捏着手指,不时抬头看一下在周边玩耍的小伙伴。最终,在老师的指导和鼓励下,才开始抬起头回应记者的提问,并用含混嘶哑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出,“我叫陈小伟,今年 12 岁,来自河北衡水,爸爸妈妈在北京打工,我爱吃凉面,我以后想当特种兵……”

小伟是个长相清秀的小男孩,皮肤白净,眼睛明亮而清澈,仔细观察才能发现他与其他孩子的不同之处——右耳上佩戴着一个小小的助听器。

小伟是一名来自农民工家庭的听障儿童。

“迫切需要抢救性康复治疗”

整个沟通始终伴随着误差和障碍,对话几度无法继续。无奈之余,小伟几次“夺过”记者的采访本和笔,把自己说不清楚的话写下来,每一笔都甚为认真。在整个对话过程中,站在一旁的老师全贵云不时地充当着解说和翻译的角色。

今年 46 岁的全贵云是北京市天云听力言语康复中心的主任,也是小伟的老师。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且拥有多年聋儿康复经验的她,近年来一直致力于为农民工家庭的听障儿童提供康复治疗和教育。

“这些听障儿童长期缺乏对声音的感知,言语清晰度和表达能力与其他同龄孩子相比存在很大的欠缺,也就不能进入普通的学校学习,又大多因为家庭贫困,没有办法进入私立的特殊教育学校。”在全贵云看来,这些农民工家

庭的听障儿童原本应得到更多的关爱和守护,但其生存状态堪忧:一方面,由于生存环境较差,听力障碍严重影响了其言语机能的发育,语言发展的迟滞又阻碍了他们对外界的认知。另一方面,由于家庭贫困,受关注度不够,他们的家庭往往未能在早期发现孩子的听力问题,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最终错过听力康复的最佳时机而迫切需要抢救性的康复治疗。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天云听力言语康复中心目前共有 76 个像小伟一样的听障儿童,最小的只有 1 岁半,最大的已经 17 岁,他们的家庭状况大都较为贫困。

“植入一套人工耳蜗需要 20 万元左右,安装一个好一些的助听器也要 4 万元,一般的农民工家庭很难去承担植入人工耳蜗甚至是购买助听器的费用。”全贵云说。

据全贵云介绍,康复中心最小的孩子今年只有 1 岁半,父母都是聋哑人,在日常生活中,由于父母没有办法及时感知到孩子日常情绪的变化,久而久之孩子总是以摔东西的方式来表达意愿。“但在学校里,只要孩子发出语气词比如‘啊’,就可以引起老师的注意,及时沟通对孩子的成长是非常必要的。”全贵云说道。

“有些捐赠物品我们不需要”

对于听障儿童而言,如何让其开口说话是最大的难题。为此,天云听力言语康复中心尤其强调采用“一对一个别化训练”方法帮助他们恢复言语技能,但这也同时意味着需要增添更多的师资。

记者来到位于北京海淀区的天云听力言语康复中心看到,整个康复中心的室内面积大约有 500 平方米,却容纳了近百人。康复中心共有 14 间房子,其中有 5 间是功能性教室,需要合用或者轮流使用,其余的一些房间

则为老师和孩子的宿舍、厨房以及老师的办公场所等。由于教室数量有限加之空间狭小,几位有着年轻面孔的老师正在宿舍对孩子进行“一对一”的言语技能恢复训练,宿舍已经发挥了教室的功用。

据了解,康复中心目前共有 21 名老师,有一多半是 90 后,他们每月工资仅有 2200 元左右,“如何弥补资金缺口,及时发出工资并且留住老师”成为康复中心现在面临的最大难题。

“工资低而且不能及时发,老师的流动性也就比较大,尤其是一些年轻的老师要求和期望会高一些,有的工作了一两年便离开了,只有少数几位是和我一起从机构创立工作到现在的。”全贵云脸上写满了无奈。

全贵云坦陈,康复中心的孩子们会交纳一些学费和生活费,依据家庭经济情况的不同,每人每月大约 800 元至 3000 元不等,也有一些家庭极度贫困的孩子没有交纳费用。在这种情况下,康复中心的日常运营大部分时间处于入不敷出的境况,资金缺口只能从社会和企业的爱心捐赠中去弥补。

除此之外,全贵云直言,康复中心目前的另一个困扰就是“有些捐赠的物品并不需要”。她告诉记者,以前康复中心接收到的捐赠物品大多是书包、书籍、玩具等,但这些物品有时却处于“富余”状态,而且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只能又转赠给其他的机构或学校。

“有的孩子光书包就有好几个了,还有一些捐赠的书籍并不适合孩子看,但事实上这些孩子有时连牛奶都喝不上,米、面、油等也时常处于匮乏状态,我们希望爱心人士如果有意愿捐赠的话,最好是提前与我们沟通确认一下,不然送来的东西可能并不是我们需要的。”全贵云说。

康复中心资助企业之一的道客巴巴网站主编王银凤说:“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康

复中心的过道中摆满了另一家企业捐赠的成箱的卤蛋,孩子们每天吃卤蛋,都要吃吐了。”后来,通过了解康复中心的需求,他们为孩子们购置了 4 张大鼓,锻炼其对声音的敏感度。9 月 13 日,天云听力言语康复中心在北京恒基中心商场举办了一场感恩义演,开场节目便是孩子们带来的精彩的大鼓表演。

长大后走向社会何去何从?

莹莹是康复中心年龄最大的孩子,今年 17 岁了。看着日渐成熟和懂事的莹莹,全贵云却是忧心忡忡:以后若是离开康复中心,她何去何从?

毫无疑问,由于先天的缺陷以及后天成长环境的差别,一些农民工家庭的听障儿童在社会适应能力和生存、生活技能掌握方面与社会上同龄的孩子有着不小的差距。

在全贵云看来,像莹莹这样的孩子在离开康复中心后能不能顺利实现就业依旧是个疑问,未来的生存状况着实让人担忧,所以她打算与莹莹的父母商量,让莹莹 18 岁以后能够留在康复中心,做一些适合她的工作,能够养活自己。“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这么多的孩子早晚肯定要走向社会的。”

全贵云告诉记者,她希望未来能够开办一个介于聋哑学校和正常学校之间的“中间学校”,在呵护这些听障儿童健康成长的同时,开展和就业相关的、有针对性的“后续教育”,让他们掌握一项可以终身受用的生存技能;另一方面,积极和相关的企业对接、合作,帮助听障儿童顺利实现就业,最终形成类似于英国、香港等地的“社会企业”运营模式。

事实上,“社会企业”模式的核心要义就是一些企业通过商业手法运作,调动社会力量,为竞争力稍逊的弱势群体提供培训或本

地服务,创造就业机会,进而解决社会问题,如国外的一些盲人咖啡厅或者流浪汉家具加工厂等就是采用此种模式。

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及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的相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残疾人总人数约 8502 万人,其中听力残疾 2054 万人,言语残疾 130 万人。另外,约有七成多残疾人生活在农村,其就业水平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多数没有独立的经济保障,如何针对这类群体构建一种有效的职业教育机制,提升他们的生存能力和就业能力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难题。

那么,全贵云所讲述的关于“社会企业”模式的愿景能否顺利实现?实现路径在哪里?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研究中心主任张网成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我国能够生存下来并且发展较好的社会企业可谓寥若晨星,这与庞大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非常突出。

张网成告诉记者,“社会企业在中国的发展面临很多瓶颈,受到政策、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制约。但最根本的还是资金投入不足,不管政府还是社会,资金来源渠道亟待打通,应该形成一种‘以政府为主,社会配套’的供给机制,同时在税收等方面对这类社会企业给予更多的优惠,而这首先需要政府撬动固有的格局。”

在采访快要结束之时,正值孩子们中午用餐时间,整个康复中心弥漫着缕缕饭香,包括小伟、莹莹在内的几个孩子纷纷围坐在全贵云的身边,用近乎记者“听不懂”的发音讨论着今天中午饭菜的内容,彼此的脸上写满了心满意足的喜悦,并不时传出阵阵笑声。

在孩子们无声的世界里,在全贵云艰辛守护的日子里,这样温馨和美的氛围显得弥足珍贵,但它能持续多久,我们无从知晓。

(文中陈小伟、莹莹均为化名)

福建近半流动人口家庭处于分离状态

该省流动人口发展报告显示,流动人员周工作 6.27 天,日工作 9.74 个小时,劳动时间偏长

流动人口月均收入 3331.41 元,城镇就业人员为 3710.4 元,流动人员周工作时间为 6.27 天,每天工作 9.74 个小时,劳动时间和强度偏长、偏高。除了与城镇就业人员的收入差异,性别、教育程度等不同也在拉大收入差异,而且拉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调查显示,流动人口家庭收入水平虽总体上涨,但扣

除价格因素,收入增长水平还是滞后于支出增长水平,支出主要还是以生存需要消费为主,尽管恩格尔系数达到了 48.44%,温饱向小康过渡了,但还是高于全国 44.24% 的水平。

报告也显示,流动儿童义务教育期间在福建还是能较好地享受到教育资源,入学适龄流动儿童在学率为 98.86%,且 83.07%能够

入读当地公立学校,享受与流入地居民同等的教育资源。但报告同时指出,在闽流动儿童学前教育 and 高中阶段教育情况不容乐观,学龄前儿童入园比例较低,只有六成,且 80%左右就读私立幼儿园,义务教育后阶段,流动儿童的在学率只有 54%左右,“意味着相当一部分孩子在接受完初中教育后就已结束学业,

直接跟随父母进入城镇劳动力市场”。

此外,报告还显示,流动人口基本未被纳入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就业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各项社会保险的参保率和享有各项社会福利的比例均处于较低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政策覆盖面不全,还不能适应流动人口家庭化迁居的需要。



“夜读”书吧 首现沈阳

10 月 13 日,在东北城市沈阳,首家倡导“夜读”的书吧在满城尽带黄金叶的季节里诞生了。

华灯初上,街道闪烁的霓虹灯和行色匆匆的行人在喧闹一天的城市里渐渐安静下来。沈阳的夜生活渐渐开始了。

书吧吧繁忙一天的人们提供充电的场所,其坐落于南杏林街上,营业时间从上午 10 点到晚上 24 点,店内古朴典雅的装修,给人以宁静安逸的感觉。

风之子/CFP

生命的价值岂能用暂住证衡量?

新华社记者 闫睿

安徽省肥西县路大爷近日在儿子生活的杭州遇车祸身亡,仅因老人未办暂住证,保险理赔便按农村、城市的区别,两个标准竟相差 40 余万元。同样的生命,仅因一张暂住证就体现如此的差别,再次引起人们对“同命不同价”的现实追问。

暂住证为何会成为赔偿门槛?成为生命价值的衡量标准?这一现象令人深思。

当前,中国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农民更多地涌向城市,为城市建设做出贡献,却在分享城市发展红利时被抛在一边。发生事故之后的同命不同价现象,正是对农民生命权利的漠视,显然落后于社会发展。

今年 7 月 30 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这标志着进一步推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开始进入全面实施阶段。破除城乡二元体制的不公,应从尊重生命开始,早日拆除同命不同价这堵“违建墙”,捍卫每一位公民生命的尊严和价值。

两支来自江阴乡镇的营销员队伍,创造了保险业多个第一

乡镇保险“营销先锋”的秘密

本报记者 程莉莉

9 月末的顾山镇不时阴雨霏霏,位于镇中心的一栋白色办公楼里却热闹非常。二楼会议室桌上,“郭菊英组”、“赵妹组”等名牌有序摆放,十几位有着乡村面孔却打扮时尚、言谈专业的女性热烈讨论着……这是活跃在乡镇的一支中国人寿保险营销员队伍,因保费总规模超亿元,使位于江苏省江阴市的顾山镇被誉为“全国保险第一镇”,并获得包括江苏省“工人先锋号”在内等荣誉。

另一支保险营销员队伍活跃在不远处的青阳镇,这家覆盖了青阳、月城、徐霞客三镇的营业部同样业绩不俗,被誉为“开创了中国

农村寿险营销的先河”。从最初的 60 人发展到如今的 130 多人,这家小小的营业部仅今年的新单保费就突破了 2000 万元。近日,记者走进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公司顾山、青阳营业部,探究两支乡镇保险营销员队伍创造业内多个第一的秘诀。

“越来越漂亮了。”顾山营业部一天的早会上,江阴支公司总经理顾立新对新入职几名女营销员道,营销员们则笑着感慨保险改变了自己原本的人生轨迹,也改变了当地不少居民的生活理念和命运。

顾山镇面积虽小,在历史上也是个说得着的地方。这里有为历代骚客吟咏不已的古老红豆树,有让古今文人心仪不辍的昭明太

子读书处……而郭菊英这个普通的名字,在 2 万多人口的顾山镇广为人知,让周围五里八乡的百姓感到温暖和安全。

郭菊英带领团队有着超前的思路。在她摆满了奖状、奖杯的办公室,郭菊英侃侃而谈。“随着养老、医疗、住房制度的改革,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家庭小型化的来临,寿险业的黄金时代即将到来。”她常告诫营销员,保险决不是单为个人赚钱,而是在实现自我价值、造福他人。只有带着这样的理念,才能超脱现实的重重困难,在她的带领下,顾山营业部的保险营销员从最初只有 3 人发展到现在逾百人,市场份额占当地的 90%以上。迄今已为近 4 万人提供保险保障,其中既有土生土长的

本地居民,也有外来务工的新居民,更蔓延到江阴以外的张家港、常熟、上海等地区及其居民。

不过,在乡镇凝聚起一支以女性为主的有战斗力的队伍并不容易。由于保险代理人制度的特殊性,又地处乡镇,业务员实际处于半自由化状态。为保证出勤率,两家营业部都实行严格的纪律。青阳营业部完善考勤制度,一周坚持 5 次早会,严格执行,十几年来如一日;顾山营业部除了必须参加晨会,在团队里推行富有挑战极限的竞争激励机制,按个人业绩进行排行公布等。记者在顾山营业部“明星员工”榜上看到,几十名业绩优秀的营销员几乎都是女性。“队伍是根本,是前

提;基础管理是抓手,是过程;业务是水到渠成的结果。”青阳营业部经理王小龙总结道。该营业部高级经理顾丽华年收保费 1000 多万元,客户数量已经多达 2500 人,并成立了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工作室。为了接受记者采访,她当天推迟了一份 300 万元保单的签订时间。

记者采访发现,两家可谓业内“先锋”的营业部都出现在江阴市并非偶然。江阴地处苏锡常“金三角”几何中心,区域经济发展,数据显示,其以全国万分之一的土地、千分之一的 GDP,二百五十分之一的财政收入。目前累计已有上市公司 32 家,33 只股票,其中境外上市公司 10 家。当地“富人们”的保险理念与保障需求相对较高,营销员名下的高端客户比比皆是,而与全国大多数乡镇不同,江阴乡镇少有人外出打工,相反却吸引了不少外地人到此务工。“除了中国人寿的品牌优势和集团优势,区域经济优势是我们发展的信心和动力。”王小龙经理说。

缴费年限长转接困难 打工者难享社保福利

据财新网 10 月 11 日报道,今年满 50 岁的女工杨丽云 1994 年来到深圳宝安打工,工作 20 年,但社保缴纳不足 8 年,并且无法补缴。“只能转回老家,领走个人缴纳的部分,大概 8000 元,我 20 年的青春与付出只能换回这一点。”

【点评】我国法律规定,持续缴纳年限超过 15 年才可在退休时申领基本养老保险,但像杨丽云这样工作几十年,社保年限只有几年的打工者比比皆是。对于社保转接,如果参保人到了领取年龄,参保时间还不够 15 年,养老关系就要在新农保进行结算。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转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不能转移 12% 的统筹基金,只能转移自己的那一部分。社保缴费年限长,社保转接困难,这也难怪那么多打工者不愿参加社保。

一打工子弟学校老师 多次带 12 岁女生开房

据《京华时报》10 月 12 日报道,12 岁的小颖一直在北京某打工子弟学校上学,今年 6 月小学毕业后,她在假期参加了班主任老师曹某的补习班。此后 3 个月内,曹某与其开房 9 次,每次开房后都给小颖数额不等的现金,日前,曹某已被海淀警方控制。

【点评】在教育部刚刚发布师德禁行行为“红七条”之际,竟然出现这种令人发指的事情,值得我们反思。有评论指出,打工子弟学校对教师的审查不严和日常管理疏忽是此事发生的主要原因,但事实上,此类事件并非只发生在打工子弟学校。可见,问题并不是出在这,师德败坏者没有得到严惩和未成年人的性教育缺乏是此类事件的主因。因此,师德“红线”必须持续严格执行,而家庭和学

安徽一农民工工资被拖欠 其子给省委书记留言获助

据人民网 10 月 14 日报道,近日,一名安徽网友给省委书记留言,称他父亲去年在阜阳市某建筑工地干活,工资被拖欠。对此,中共阜阳市委办公室答复称,网友反映情况属实,经调解,开发商已于 9 月 22 日向网友父亲支付了拖欠工资 14225 元。

【点评】只要网络搜索“农民工”三个字,每周都会发现多篇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新闻。各地政府都在强调解决这个问题,媒体也常常呼吁,为何欠薪问题就是屡禁不止呢?试想一下,假如这名农民工的儿子不给省委书记留言,被拖欠的工资能要回吗?当然,即使在网上留言,也不一定能够得到关注,因此,阜阳市有关部门及时回复网友留言并帮助其父亲讨回了血汗钱值得点赞,但是要治愈欠薪这一顽疾,政府部门需要做的还很多,目前来讲,关键是要对欠薪行为加大打击力度,从严从重惩罚。

“职业介绍所” 助农民工本地就业

据《湖南日报》10 月 14 日报道,郴州市嘉禾县 242 个行政村(社区)都设立了“农民工职业介绍所”,现在农民工了解企业的用工信息不用出村,在家门口就能找到事做。据了解,今年 1 月至 9 月,嘉禾县已有 600 多名农民工通过“农民工职业介绍所”找到了工作。

【点评】当前,国际国内产业分工深刻调整,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步伐加快,相应地也能够为中西部地区提供很多就业岗位。而湖南的嘉禾县在村里设立“农民工职业介绍所”,为企业及农民工搭建信息平台,促进农民工本地就业,正是顺应了经济发展的趋势。据了解,几名从广东等地回来的农民工,不到一周就在县里找到了工作,这说明相比城里的“专项招聘会”,村子的“农民工职业介绍所”确实受农民工欢迎,也能够解决实际问题,此做法值得推广。

(点评 杨召奎)